

引 言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将作为新旧格局交替进程中尚未完结的一段过渡期而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冷战结束和“雅尔塔体制”的瓦解，在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引发了霸权体系与多极化趋势之间的激烈角逐；中美、日俄的“两盛两衰”势头，催生了“美日向心”和“中俄接近”的崭新业态；经济全球化浪潮愈益显示出不可阻挡之势，而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一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锐利锋芒；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则在西太平洋地区勾勒出了一幅亚太、东亚、东南亚与东北亚这三个层次地区合作既相补充、又相牵制的复杂图景。

国际格局与秩序的演变趋势，促使各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这些调整趋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汇合成了一股国际关系重新定位的汹涌潮流。

以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为背景，我国的对外关系在多边与双边两个层次都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变化的新阶段。其中，中日关系的重新调整与重新定位，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从宏观定位的视角看，日本作为我国的重要近邻，两国关系既充满合作的机会，同时也充满矛盾和竞争，这一双重性质在较长时期内不会轻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就微观定位而言，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合作、竞争还是对立，能否力争实现每个时期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最佳双边关系前景，则

取决于各时期的内外环境以及中日相互作用关系中的诸多因素。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日关系并没有能够总是做到实现当时的最佳前景。

回首一部中日关系史，在以往的两千年岁月里，中国在绝大部分时期里都保持了向日本传输先进文明的“先生”地位；古代各时期日本对这种中日关系定位所采取的态度，或是由衷欢迎，或是消极抵抗，或是正面挑战。

近代以来，日本急掉船头改学西方，我国的许多革命先驱曾东渡日本求索革新图强的良策。然而，历史证明日本并没有具备充当“先生”的资质，它囫圇吞枣地兼收并蓄了西方的国际公法和弱肉强食的野蛮习性，以前者与欧美列强周旋，以后者吞并亚洲近邻。对中国这个千年先师，日本推行了以侵略与掠夺为基调的“大陆政策”，给中华大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深重灾难。

二战以后，中日两国分别向东西两大阵营“一边倒”。在两极冷战格局下，两国关系处于政治上相互隔绝的状态，只是勉强维持和发展了少量民间贸易与交往。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友好人士们克服极端困难，为恢复邦交、推动交流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东亚地区出现了中美苏战略三角结构，这对美苏两极格局产生了重要的修正作用。中美关系的改善，大大减轻了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牵制压力，加上日本各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汇流成了强劲潮流，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境地。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国终于实现了政治关系正常化。当时，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作出庄重承诺，中日双方一致赞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两国关系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的政治基础。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签署了立法层次上的《和平友好条约》（同年 10 月 23 日生效），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宣告两国将超越社

会制度的差异而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这是两国安全关系保持稳定的基本保证。这两个重要文件在理念和制度上为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确定了原则框架，两国关系的重点由此转向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全面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现代化路线，日本制定了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中心积极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中日两国的经贸、科技、教育、文化及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走上了全面、健康发展的轨道。1972 年以来的中日关系，被人们评价为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好的局面”。

1972 年以来近 30 年间，日本部分反共、反华、亲台势力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图谋撼动业已确立的中日‘关系基本原则。日本政府 and 各界有识之士力排这部分势力的干扰，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一冷峻的客观现实也表明，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不进则退的动态进程，其双边框架和基本原则需要时刻予以精心维护和不断完善，其成功经验和反面教训也需及时予以总结，以求趋利避害。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冷战结束为背景，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时期。“共同抑苏”需要的消失、美国影响能力的增大、中日发展势头的逆转、双方政局的变化、两国新生代的崛起，都给中日关系带来了种种不确定因素。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两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问题、领土与海洋资源问题、经济合作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均面临新的挑战。

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相互关系调整乃至一系列政治摩擦，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勾勒出了一个滑坡、止跌和上升的曲线。中日双方都认识到，如果听任相互间关系继续恶化下去，则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只有共寻“双赢”途径，才能在现有

条件下力争实现各自的最大利益。这种共识的结晶，就是 1998 年 11 月底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在这一宣言中，中日一致赞同构筑“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并确定了 33 项未来近、中期内的相互合作项目。中日关系由此进入了以构筑“伙伴关系”和落实这些合作项目为目标的友好合作新阶段。

中日关系是两国相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从我国对日政策的角度看，如何把握这对双边关系的另一半——日本的对华政策与相关社会动向，是决定我国对日反应方式的依据。就每个中国人而言，怎样认识日本的政治、安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现实，是形成其日本观的基础。中日关系的实践证明，我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和民众中的对日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联，而学术界的日本研究的地位与作用则一般来说介乎这两者之间。

实际上，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日益呈现出双方政府和舆论之间错综交错的复杂化趋势。两国的政府官员、留学生、商务人员、游客之间大量交往的“大众交流时代”的来临，则更使中日关系已不可能重新倒回到相对单纯的“精英交流时代”。这种两国关系发展的必经阶段，既推动了相互了解，也给现阶段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同时也对学术界的日本研究和政府的对日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也是我国的首位贸易伙伴和首位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及主要的资金与技术来源之一。保持和平友好的对日关系，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更好地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条件。就日本而言，保持良好的对华关系，符合其稳定周边安全、拓展国际空间、开拓中国市场的根本利益。中日地理位置之邻近、历史交往之深厚、文化关联之密切，也是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时难以轻视的重要因素。

既然如此，中日关系何故不时出现一波三折？究其根源，这是因为两国关系的原则基础经常受到一些反对势力和多边因素的

挑战，其中最核心问题依然在于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中日间“历史问题摩擦”的症结可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句话来概括。近年来，日本部分势力的否认侵略历史运动愈发呈现出向“学术”化、大众化、政治化发展之势，这股“风”可谓越刮越大。日本年轻一代对历史问题真相与性质的认识严重不足，更使日本在国家意志和社会舆论层次上正确对待侵略历史的前景十分暗淡。最近，原防卫厅长官、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野吕田芳成放出了美化日本对外侵略历史的“狂言”，竟得到了联合执政三党的鼎力保驾；一个右翼分子小林善纪炮制的漫画《战争论》和《台湾论》，以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颠倒黑白、对亚洲各受害国的肆意污蔑而令人瞠目，这样的漫画竟在日本赢得了大量读者；一些人编写的鼓吹“侵略有理”的教科书，竟在“言论、出版自由”的幌子和“政府难以干涉”的名目下大摇大摆地进入日本中学讲堂。可见，20 世纪的“历史问题”远未能得到清算，而是已被日本自己带进了 21 世纪。

近年来，日美两国置冷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潮流于不顾，大力强化双边安全同盟，甚至把台湾包括在其共同防卫的“周边事态”范围之内，给东亚安全环境造成了新的紧张，给我国的统一大业增加了难度。日本一些势力编织出种种“学说”和“理论”来为其干涉台湾问题制造根据，跃跃欲试地向中日关系的根本原则发起危险的挑战。如任其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则既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到头来也只能严重损害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是符合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方向，但朝这一方向前进的路途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只有共同努力，以极大的恒心和耐心不断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才有可能使“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一个理想目标变成客观现实。

基于以上概观，本书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的演变趋势和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进程作一番综合探讨；前者是本书上篇的对象，后者是下篇的主要内容。

上 篇

冷战后的日本外交

第一章 冷战后日本政局与外交

20 世纪 90 年代，是日本迎来重大历史性转折的时期。两极冷战格局的瓦解，给日本政界延续近 40 年的“1955 年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战后曾创造一代辉煌的日本经济一举陷于旷日持久的萧条之中；美国景气的强劲恢复和中国经济的腾飞势头，给 90 年代初曾达到一个巅峰的日本优越意识遮上了阴影；在政界“总体保守化”的趋势下，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逐渐高涨之势；大国战略的惯性和新生代的崛起，正给战后形成的日本政治理念与外交风格带来新的内涵与形态。在这一系列内外条件变化的推动下，日本政治与外交迎来了继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之后的第三次转型期。

第一节 内政、外交演变轨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经过几年的“时间差”之后，冷战结束和“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开始在日本政局与外交领域逐渐显现，现实的变化也日益深刻地反映在人们的对日认识之中。^① 本节旨在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局与外交的演变轨迹进行描述，为以下各章节循序渐进的专题研究提供史的基础。

由于战后日本屡屡成功地渡过了诸如两次石油危机、多次景气循环、日元升值压力等许多难关，起初日本内外的人们一般认为 90 年代的危机也将很快地被克服。

一、1995 年：“战后 50 周年”的政治与外交

(1) 历史反省不及格，令国际社会失望

199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各国曾对日本能否借此良机宣示其反省侵略历史的决心极为关注，但结果表明，日本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

日本曾把战后 50 周年视为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绝好时机。然而，在 1995 年 10 月 23 日第 50 届联大上的村山富市首相演讲中，这一政策目标销声匿迹，其主要原因显然在于安理会改革进展迟缓和日本在历史认识等方面国际形象欠佳。

在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上，日本朝野长期存在着“承认”与“否认”两种潮流。由于美国改变了战后初期对日本原战争势力的清算政策，以及这股势力在自民党长期政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否认势力”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向国会和内阁选送了代理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反省意识的传播受阻，“自卫战争论”、“解放亚洲战争论”、“胜王败寇论”等谬论充斥着日本论坛，政界一再出现“一个内阁两个调”的离奇现象。

1995 年 8 月 9 日，文相岛村宜伸抛出了“是不是侵略战争，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怪论。村山首相 10 月 5 日说：《日韩合并条约》在当时是“有效的”。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 10 月 11 日称：殖民统治“也做了好事”。这些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鲜和韩国的强烈抗议。

社会、自民、先驱新党三党于 1994 年 6 月开始联合执政时曾决定在二战结束 50 周年之际由国会通过一个“不战决议”。然而，执政三党之间、执政三党与在野党之间围绕国会决议的分歧日显突出。主要执政党和最大政党——自民党的 213 名议员于 1994 年 12 月成立了“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阻挠国会通

过反省决议。第二大党新进党的部分议员也组成了所谓“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同样以反对通过“谢罪”决议为宗旨。

在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本来积极推动“不战决议”的联合执政党之一社会党在决议内容上作出了重大让步，其结果拼成了避重就轻的联合执政三党妥协案。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在新进党缺席抵制、出席议员刚够法定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其要点是：“考虑到世界近代史上诸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的那种行为以及给别国国民，特别是对亚洲各国国民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个决议的要害是以强调世界性的殖民和侵略现象来淡化日本的侵略罪行，避开正面提及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个“精心设计的暧昧之作”，日本由此“失去了一个对侵略和殖民统治谢罪的最好机会”。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代表内阁发表了如下“首相谈话”作为补救措施：“在过去不太遥远的一个时期内，错误的国策使日本走上了战争道路”，“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毫不怀疑地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期间，村山首相向江泽民主席强调，他的“8.15谈话”代表了大部分日本人民对历史的认识。

(2) 对美关系重新定位，对华关系正在调整

冷战后初期，美国自恃已打败了苏联这个“冷战对手”，便把日本视为下一个最需对付的“经济对手”，其对日政策中的经济考虑明显加重，频频挥舞“超级301条款”大棒压日本开放市场。而日本也不示弱，开始在对美经济谈判中说起了“不”字。

1995年伊始，日美表现出力图改变这种局面的新动向。村山首相于1月10日至12日访美，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谈，强调

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日美协调关系”，防止经济摩擦影响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

这一年，日美经济摩擦以“汽车战”为重头戏，双方都采取了“边缘战术”，在美国扬言发动制裁的最后期限即 6 月 28 日的数小时之前相互让步，避免了一场贸易战的爆发。“航空战”也于 7 月 21 日达成了部分协议，然而紧接着“胶片战”硝烟又起。

1995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改变了 80 年代末以来的收缩兵力方针而宣布在东亚地区维持 10 万“前方部署兵力”。日本也加紧对其《防卫计划大纲》进行相应修改，对美国的新东亚战略予以配合。双方在预定在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宣言》草案中确认：继续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基础，强调日美关系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及经贸关系三大支柱构成。

1995 年 9 月 4 日，冲绳发生了驻日美军士兵强暴一日本少女的事件。这一事件在冲绳乃至整个日本列岛再度激起了抗议浪潮，修改《关于驻日美军地位协定》问题成为日美摩擦的一个焦点。美国不得不同意在维持原协定及驻军规模的前提下，对冲绳基地采取整顿、缩小、转移措施。但无论是经济摩擦还是冲绳事件，最终都没有升级到导致日美政治与安全关系破裂的地步。克林顿总统则托故取消了在这一敏感的秋季访日的计划，使双方已起草好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未能按预定时期在 1995 年内发表。

1995 年日本的对华关系围绕“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经援政治化”问题展开。5 月 2 日至 6 日，村山首相访问了中国。他于 5 月 2 日参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提笔留言：“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

是否邀请台湾高层人士出席 11 月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曾是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日本政府最

终没有邀请李登辉或徐立德参加该次大阪 APEC 会议。

1995 年，日本借中国进行核试验大作文章，宣布冻结大部分对华无偿援助。虽然村山首相于 10 月 22 日在纽约同江泽民主席会谈时表示，不把核试验问题同日元贷款相挂钩，但日方显然在围绕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的谈判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

1995 年中日经贸关系继续发展，1~10 月双边贸易总额达 448.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7%。1995 年前 3 个季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金额 51.3 亿美元，实际投入 19.94 亿美元。由于中方加强了对日纺织品出口的自主管理，11 月 8 日，日本政府决定在现阶段对中国输日棉纱不实行曾扬言要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

(3) 欲当各方之间“协调者”，力争亚太经济合作主导权

1995 年 11 月 16~19 日，APEC 第 7 次部长级会议和第 3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大阪举行，日本为落实 1994 年 APEC “茂物会议”提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而拟订了“行动议程”，并就此同各成员进行了双边及多边协调工作。

美国从“亚太共同体”的战略构思出发，欲把 APEC 变成与欧盟相抗衡的区域经济集团。对此，不少亚洲成员心存疑虑。日本则力求在美、亚之间保持平衡，既不愿置美国的意图于不顾，又不能对亚洲各国的要求置若罔闻。在经济区域化潮流中，日本还不想公开主导一个东亚经济区域集团，以免加剧与美欧的贸易战而得不偿失；但若无所事事，则将被隔绝于区域经济集团化潮流之外而蒙受损失。日本所选择的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路线，即主张非集团化的亚太经济合作，以兼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双重利益。兼有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双重身份，是日本采取这一条路线的基础和潜在优势。因此，日本在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对操之过急的自由化、机制化则持谨慎态度；在对外关系方面，强调“自由化的好处应当给予所有国家”，并主张向世

贸组织的诸原则看齐。

日本在把《茂物宣言》提出的目标变成具体的“行动议程”方面，遇到了诸如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范围和手段等各国间很难予以调和的分歧。作为世界第一经济援助大国，日本把强调经济技术合作视为大阪会议的重头戏，主张当务之急是加强“先行的发展中国家”、“后期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日本选择的是一条“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能接受而又有利于其自身的现实路线，即一方面利用美国对亚洲的开放市场要求来改善地区贸易、投资环境，同时又以 APEC 的适度机制化来加强自身在本地区的地位。

日本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立场是：以成员的“协商一致的单方面行动”为基础，不是进行单个领域谈判，而是设定一定标准，由各国自己推进自由化；从可能的领域开始，各国和地区统一步调，采取自由化的“集体行动”；在基准和认证、通关手续、竞争政策等领域协调一致，使区域内投资与贸易顺利进行。

日本于 1995 年初在外务省和通产省设立了专门负责人，新年伊始便开始全面展开围绕大阪 APEC 会议的“争取支持外交”。经过紧锣密鼓的双边磋商及几轮各成员高级事务会议的协商，各方之间的共识和分歧越来越明确，终于就提交大阪会议的“行动议程”草案达成了协议，并基本上顺利地开成了该次会议。

二、1996 年：“日美同盟再定义”成为主题

(1) 日美加强安全同盟，经济摩擦退居其次

1996 年日本外交的重大举措，就是对日美同盟作了重新定义。冷战结束后，原以“苏联威胁”为主要防范对象的日美同盟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对此，90 年代上半期日本国内各界议论纷纷，其结果是维持日美同盟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其理由是：第一，

在东亚地区尚难建立集体安全体制的情况下，日本若要摆脱《日美安全条约》，就可能要加速包括核武装在内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而这必将招致各国的强烈反对而成为众矢之的；第二，构筑独立防卫体制必须大幅度增加防卫支出，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第三，日本近期国家战略目标是成为“政治大国”，为此需要在世人面前保持“和平国家”的形象。而美国出于在东亚推行霸权战略的目的，依然需要日本这个盟友，尤其是需要驻日美军基地。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日本出现了两股对日美同盟产生离心影响的倾向：一是经济摩擦、冲绳事件等在日本民众中激发起来的反美情绪；二是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化而滋生的民族主义思潮。有鉴于此，美国也认为有必要重新加强美日同盟，其主要手法就是大肆渲染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借此保持和加强美日安全同盟。

1996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了日本，并于 4 月 17 日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以下简称《联合宣言》）。该《联合宣言》对冷战结束后的日美同盟进行了重新定义，确认了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

在冷战业已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下，日美重新加强安全同盟的作法不能不引起世人担忧。日本在日美同盟这个“外壳”掩护下加强对外军事作用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的忧虑和警惕。

1996 年日美经济关系平稳发展。虽然经济摩擦并未停息，但两国优先重视安全同盟的姿态掩盖了经贸争吵。是否延长 1996 年 7 月底期满的《日美半导体协定》，曾是 1996 年两国间经济摩擦的重头戏，其结果双方互作妥协，达成了照顾双方立场而内容含糊的协议。但日美在航运、胶卷、保险等领域的摩擦仍未得到解决。

(2) 中日关系有所发展，加强友好合作成为重中之重

90年代以来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之势和安全战略的调整趋势，对中日政治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中日经济关系继续得到较大发展。

自1995年起，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在中日之间的一些敏感问题上屡屡发难，使两国在政治、历史、安全、领土等领域摩擦增多，妄图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1996年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事项有如下几项。第一，“日美安全同盟重新定义”。日美安全同盟重新定义的方向所指，在中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和戒备心理。第二，“经援继续政治化”。这一年6月，日本继续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推迟派团到中国考察日元贷款项目，一度对已达成协议的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持消极态度。第三，“右翼势力屡登钓鱼岛”。7月，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团体“青年社”屡次到钓鱼岛上建立灯塔；7月20日，日本政府又继而宣布开始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使本已搁置的中日领土之争再度激化。第四，“桥本参拜靖国神社”。7月29日，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后11年来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严重伤害了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感情。所有这些事态严重危及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使中日关系的政治环境明显恶化。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克制忍让，作出多次严正交涉，并注意维护中日友好大局，方使得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矛盾得以缓解，日本有些人的破坏中日关系的企图未能得逞。

另一方面，经济技术合作已成为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强有力纽带。1996年中日政治环境对两国经贸关系虽有所影响，但未动摇其根本。日本对华投资继续增加。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中日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标志。

1996年11月7日桥本第二次组阁后，很快表明了改善中日

关系的方针。桥本首相在 11 月 24 日日中首脑马尼拉会晤等重要场合一再强调：“日中关系是和日美关系同样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历史问题上坚持 1995 年 8 月 15 日的“村山谈话”精神。在钱外长和池田外相的会谈中，两国就恢复日本对华日元贷款谈判问题达成了协议，关于 1996 年度贷款项目的事务级谈判也很快达成了协议。马尼拉会谈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3）日俄关系有所发展，联合国外交略获小胜

这一年日俄关系有所进展。4 月 27 日，日本防卫厅长官臼井日出男访问俄罗斯，与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会谈，实现了“日俄两国积极开展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广泛对话”的承诺。但在困扰两国关系的北方领土问题上未见实质性突破。日本对俄经济合作方针也出现了松动迹象。11 月 12 日，日本政府决定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扎鲁比诺港开发计划实施支援，总投资达 2.4 亿美元。与此相呼应，11 月 15 日俄外长普里马科夫访日时，提出了“联合开发北方四岛”的建议。对此，日方态度谨慎，显然惟恐处理不当影响北方领土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 10 月 21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与印度围绕亚洲地区改选的一个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展开了激烈争夺。日本以提供经济合作为锐利“武器”，展开了争取联合国成员中票数众多的非洲国家支持的活动。投票结果，日本在 180 张有效选票中获得了 142 张，第八次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日本在 1997 年 1 月就任联大主席国。

这一年的 APEC 会议于 11 月在马尼拉召开。日本原想在此次会议上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开放农产品市场问题上态度消极，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1997 年：新的对俄政策最引人关注

1997 年，日本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经济外交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其联合国外交未能实现目标。

（1）加强日美安全同盟

1997 年 9 月 23 日，日美发表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安全同盟“再定义”过程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该《指针》使日美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日本从仅向美军提供基地转变为在所谓“周边事态”时也提供“后方支援”，其中不乏其直接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美在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下反而大力加强安全同盟，不能不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措，在亚洲各国引起了疑虑和警惕。

日美两国在是否将台湾排除在日美共同防卫合作范围之外的问题上采取了暧昧态度。经中国一再要求对此予以澄清，日本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仍未明确承诺日美安保合作范围不包括台湾。

（2）改善对华政治关系

中日政治关系曾于 1995、1996 年跌入低谷，两国间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安全问题上出现了全面摩擦局面。另一方面，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共同的地缘利益抑制着政治摩擦进一步升级。

1997 年伊始，日本政府一再表示要把邦交正常化 25 周年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良好时机。9 月 4 日至 7 日桥本首相访华，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会谈，重申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他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作了题为《新时代的日中关系》的演讲，并去沈阳参观了“9.18 事变博物馆”。在访华之前，桥本首相提出了如下对华外交四项